



光明学术文库
GUANGMING ACADEMIC SERIES

杨迎平 / 著



永远的现代

——施蛰存论



Y ONGYUAN DE
XIANDAI

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人：朱 庆
责任编辑：茹新平
封面设计：何成宝

《光明学术文库》简介

《光明学术文库》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该出版工程采取“媒体发动，学界审评；光明出版，社会馆藏”的形式，常年征集、精选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优秀原创学术成果，及时向社会传播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前沿的新思想、新发现、新进展，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

《光明学术文库》将秉承光明日报“理论前沿型、学术探索型、知识密集型”的传统风格，精心组织、精心编校、精心出版，充分发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的宣传优势，宣传推广这项国家重点图书出版工程，力争使之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具有权威性的学术著作品牌。



上架建议：文学类

定价：39.80元

ISBN 978-7-80206-426-3



9 787802 064263 >



光明学术文库
GUANGMING ACADEMIC SERIES

杨迎平/著

永远的现代

——施蛰存论



YONGYUAN DE
XIANDAI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基金项目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的现代:施蛰存论/杨迎平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4

ISBN 978-7-80206-426-3

I. 永… II. 杨… III. 施蛰存—文学研究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2017 号

永远的现代:施蛰存论

作 者: 杨迎平 著

出 版 人: 朱 庆

封面设计: 何成宝

责任编辑: 茹新平

版式设计: 田 苗

责任校对: 辛 平

责任印制: 胡 骑 柴自邦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34(咨询), 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33,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装 订: 北京新丰印刷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本: 690×975 毫米 1/16

字数: 260 千字

印张: 17.5

版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206-426-3

定价: 39.80 元



| 施蛰存青年时期 |



序

徐中玉

杨迎平教授十多年前，已私淑施蛰存先生，多次直接与施老接触，谈话，得到施老不少指导与帮助。施老逝世后，她有志写成《施蛰存论》，我得以先睹。读过深感她是有条件、有魄力写好这本书的。施老虽逝，至今有不少论文和回忆性文章继续发表在各地报刊上。这主要由于他在现代文学事业上有影响。无论在创作、教学、翻译、编辑等各个方面，包括古今中外，他都有许多贡献、实绩，而且都有其个性特点。会留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上和朋友、后学们的心中。他的许多文字，所提出的问题，所表达的特见，几乎都是值得注意、参考的。他一生大多数的时间都生活在上海，文艺界熟人最多，接触的面最广，经历的事情也极多。所以，国内外想多多知道当时上海文艺界活动情况的学者，多去访问他，也已有不少这方面的文字留下来。要写好论施老一生贡献的书确实不易，没有较长时间直接与他的接触，不仔细读过他的许多著作，不参酌许多已论述过施老的重要资料，那是很难有成的。何况，由于长期以来，曾存在着不少对施老的误解与偏见，把思想观点之异，作用之异，或兴趣之异，动辄看成是敌对、不容共同存在的东西，如果缺乏开明、与时俱进的独立思考精神，“论”就颇有站不住的可能了。我看难得的是，迎平此书大体很翔实、客观。施老当年主编的《现代》杂志。过去曾被蒙上了不少责难。后来、至今岂不已被公认为当时很有特色的名刊了吗？施老在晚年荣膺上海市、政府性的“文学大奖”，是由上海市文艺界各方联合一致推举出来的。这是施老在历次运动中受过多年压抑伤痛之后得到的最彻底的解放；对他过去作出许多贡献的承认与鼓励。三十年代在对《庄子》与《文选》问题的论争中，他认为学学这两种名著有助于青年作者多掌握到可以利用的词汇，鲁迅认为这对青年有害，妨碍他们进步。“笔战”文字中施老当时诚有“血气方刚”的不妥处，可他从未改变过原来的观点。依我看来，当时观点之异，乃“乐山乐水”，完全可以各乐其乐的。在鲁迅墓搬迁到虹口公园中那一天，那时鲁迅像已矗立在园中，我也去参加了这个隆重活动。当



时外地作家特来参加的也不少。我忽然发现施老原来也挤在远处的人群里。待结束后我再去找他以便一道回校，却已找不到他了。他心里并没有忘记鲁迅。因为我听到他这样讲过：观点归观点，对鲁迅我还是很尊重的。

迎平此书分为三编：综合论、创作论、比较论。下列各章各节，清晰有条。我很赞赏她这种写法。书中有几篇曾在《文艺理论研究》发表过，反映良好。

施老比我大十岁，我向视他为师辈。1939年我从重庆去迁在云南澄江县的中山大学研究院当研究生，知他正在昆明云南大学任教，特去拜会了他，承多指教。1946年抗战胜利，我从广州回家经过上海又得晤面。1947年我从青岛回上海在沪江大学任教，1950年章靳以把施老也请到沪江，我们就成了同事。1952年院系调整前，章靳以、朱东润、余上沅、朱维之、施老和我，一起参加思想改造，结束后，东润、上沅两位去复旦，蛰存和我去华东师大，维之去南开大学，靳以去上海作家协会协助巴金主持工作。我们就这样同事相知60年。“反右”、“劳改”、“文革”后的监改，一直在一起。历次运动都必涉及他，现成的根据就是“洋场恶少”。退休后，我隔段时期就会去看他，谈天。知道他很达观，但不是毫无顾虑，例如：要恢复同“国际笔会”的关系时，上面决定要成立“上海笔会”。华东师大指名许杰、施蛰存、徐中玉、钱谷融，兼职的还有王元化。仍得征求本人是否同意，许杰向施询问时，施一口拒绝，“我不参加，这个笔会岂不是资产阶级的？”许老要我再告知施，这是上面提出的，有什么关系。我去说了，他还是不愿意：“国际笔会的参加者当然都是资产阶级作家，说不定什么时候批判起来，谁说得清楚。”他实在被“洋场恶少”四字压抑得太久了。这情况后来才得以逐渐放松下来。

施老最后一次住进华东医院后就未能回家，真的仙逝了。住院前钱谷融兄曾到他家去探望。施对谷融说，好久没见到我们，说身体好些一定要请我们两人去吃顿饭，谈谈天。不久他就住院去了。似乎身体还可以。我去医院看他时，他不能坐起来说话，说“我明天就要出院了。”其实，这是他真想回家。医生力劝他住下来。他又提出回家后就找我们去吃饭；他很关心老同事们。他的病状很快恶化，逐渐连进食也主要靠打针、鼻饲。鼻饲很难受，他总要拉掉。我先后去看过他四五次，他是越来越严重。那时他已99岁。终于，医院发出“病危”通知。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去医院。他已张不开眼，但从我们的声音，知道是我们来了；用手向我们招了一下，讲不出一句话。我们只有在他床前坐了个把钟点。不幸次日早上他真的走了，待我们



赶去时，已再也听不到他的任何动静了。现代中国文学界中这样一位丰富多彩的老同事、老朋友真的走了，再也回不来了。但他一直仍活在老朋友、后学们的心中。他的各种贡献能够长期产生影响，留给后世。

迎平此书，增加了、也丰富了我对施老的认识和敬仰。我是一直鼓励、期望，乐观其成的。她一定还能写出不少佳作来。

2007年4月24日于上海



走近施蛰存先生

中国 20 世纪 30 年代的现代派作家施蛰存先生于 2003 年 11 月 19 日走完了他近一百年的生命历程。

施先生匆匆离我们而去，这噩耗来得那么突然，施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甚至我几月前还给施先生打过电话，是他的曾孙女接的，说近期去上海看望他老人家，曾孙女搁下话筒去告诉施先生，然后回话给我：“可以。”因为一些锁事的拖累，上海之行就拖下来，没想到成为终生的遗憾。

我与施先生认识、通信交往已十几年。

认识施先生以前，我对施先生充满了神秘感。这神秘感是来自多方面的，首先是读了他的具有现代因素和荒诞魔幻色彩的小说以后，由作品的神秘而对作者的神秘，并以为他是十里洋场风流倜傥的人物，是如刘呐鸥一样的浪荡子。其次，是因为他与鲁迅的论争，以及他主编的《现代》杂志中的关于“第三种人”的论争，文艺界对他误解较深。也使我与施先生充满神秘感，甚至迷惑不解。

走近施先生之后，使我弄清楚了我曾经迷惑不解的问题，神秘感也化为亲切感，我觉得施先生不仅是我的研究对象，而且是我的一个可亲可敬的亲人，我将施先生当作我的无话不说的亲爷爷，我有什么苦恼，有什么疑问，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都是写信给施先生，施先生接到信立即回信，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991 年初，我正在为写《中国现代小说流派论》一书收集资料，经春秋，已颇有收获，唯对 20 世纪 30 年代现代派知之甚少，资料的缺乏确实让人吃惊——在目前传记文学蜂拥的情况下，竟没有一本施蛰存的传记或评传。为了了解 30 年代现代派作家的情况，这年 7 月初，我冒昧写信求教于施先生，将信寄到华东师大中文系。我当时是抱着试试看的心里，没指望施先生真给我回信。一个月后，我收到施先生 8 月 9 日的回信，信一开始就说明了



迟回复的原因：“大函昨日始从校中转到，因我已退休，不住在校内，一切书信文件均须便人带来，现在暑假中，已好久无人来，故大函迟了一月才见到。”在这封信里，施先生向我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的研究现状，并谈了他对自己作品的看法，他说：“我在青年时代，写了一些小说，中年以后，搁笔改行，旧作也自己不想提起。想不到近年忽又‘走红’，亦颇感青年人好奇好古。但我自己却不想多谈，行过之生命，已为陈迹。这些作品，在我，已是历史文献了。”对我在信中谈到的对他的作品的理解，施先生也给我鼓励：“承你推重，只有惭愧，……你说我的小说‘干净’，这一观点，倒没有人说起过，大概这是一位女读者的特有敏感，男读者不会注意及此。”施先生还随信给我开了一个他的作品目录。

因为施先生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与施先生的通信中，我不但请教学问，也谈一些思想困惑，针对我的信中的情绪，施先生回信说：“有一句话，我要和你辩论，你说我‘可能不会理解’你，错了，我很理解你，因为像你这样的女教师，我这里很多，她们的想法境况，都和你没有什么不同。你今年才三十多岁，可知你读大学是在‘拨乱反正’之后，这已经是幸运了，有许多五十多岁的讲师、副教授，都是在1958~1968年阅读大学的，他们根本没有读书，只是靠运动发迹，1978年以后，他们的过去的二十年，成为废物，急起直追，开始用功，有的能够维持下去，有的被淘汰了，至今不能上课，这些人才是‘虚度’了最关重要的二十年。你不用悲叹虚度年华，抓紧时间，还可以‘亡羊补牢’。从1978年到现在，我的一切工作，都是补1958~1978年的空缺，幸而我身体好，才能补上，别人恐怕办不到。因此，我劝你！”施先生还告诉我，为了将失去的时间补回来，要维护身体的健康，他说：“维护身体健康，只要你现在心肺肠胃无病就容易维护。我的养生方法很简单，可以传授给你：（一）每日早起，深呼吸五分钟，最好在空气洁净的地方。（二）深呼吸后，喝一杯盐开水（温的），前者是养肺，后者是清肠胃。此外，还要多吃蔬菜，这是扫除肠秽的‘拖把’。女同志有家务事做，这是一大损失，我不知道你爱人是如何人？华师大的青年教师有许多能分任一部分家务，只要生活有规律，夫妇合作得好，也不至于受多大损失。生活安排得好，才有可能做学术研究工作，对女同志尤其必要。”（1991年9月18日给笔者信），施先生常来信鼓励我多读书，鼓励我做好文学研究工作，并一再要我开个书单：“你需要什么书？可开一书单来，如果我有，可以送你几本。”“我孙儿在上海书店工作，买书还较方便。不过现在上海书店很少供



应我辈所需要的书，满个书摊都是服装、烹调、台湾小说、色情小说，外省版书更不易寻找，东北的书几乎不到上海。”（1991年国庆节信，这次信落款“北山”，并说“以后用此名”）施先生不断来信问我要什么书，“收到二月二十七日手书，知前寄各书均已妥收，甚慰。你还要什么书，可来示，……你告我一个方向，我还可以送你一批。”（1992年3月7日）施先生多次给我寄书，每次都用牛皮纸包得整整齐齐，再用透明胶带缠得严严实实，几年来，给我寄了几十本书，有作品，有评论者的专著，还有杂志。对一些评论文章、评论专著，施先生会提出一些不同的观点，有的在书上写眉批，有的在书中夹上写着意见的纸条。甚至对书中的错字，以及译文的错误，施先生都一一改正过来。寄来的杂志施先生都在目录上将要求我看的文章用红笔打勾。施先生还在来信中叮嘱：“你看过，随时把你的读后感告我。”（1991年10月1日信）读施先生寄来的书，我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我在与施先生通信中，谈到我母亲也同施先生一样，被错划成右派，施先生便来信说：“你母亲是‘右派’，当然也是知识分子，还在不？做什么事？你的经历，也是一种典型，为什么不写一点自传性的文章，做个记录？”我写信告诉施先生我母亲的近况后，施先生又来信说：“你母亲一生坎坷不平，大可以写一部自传，近年我看了三部女士的自传，一部是潘念的《生与死在上海》，潘的丈夫解放前做外交官，解放后不久去世，潘有一女住在上海。文革中被诬为美国特务，在看守所关了十年，四人帮粉碎后，释放出来，即去美国，女儿在文革中自杀，潘到美后，用英文写了一部自传，记解放以后她的一切遭遇。此书在美畅销，使她发了财，现住在美，此书已有中译本，值得一读。另一本是赵元任夫人杨步伟的《一个女人的自传》，也是英文本，台湾出了中文译本。又一本是去年湖南出版的《宗岱与我》，是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写的，也很好，你可以找来看看，也请你母亲看看，最好是让她看到《生与死在上海》。”施先生还在信中特别叮嘱：“你母亲百劫余生，精神状态一定不正常，你们不可顶撞她，受了刺激会发疯或中风，请注意，一切顺从她。”（1991年10月22日信）施先生是如此的善解人意，如此的清醒豁达，真令人感动。

1992年，我打算从教育学院调出，当时有两个地方可去，一是进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继续当教师，一是进地方报纸当编辑。我写信给施先生征求意见，施先生立即回信说：“我希望你改换一个工作岗位，而不要改行，更不要下海，我建议你进湖北师院，将来有希望改为师大，地方报纸编辑不必考



虑，教育学院迟早要取消的，在高校工作，多少有点学术气候。”施先生非常热爱教育工作，将其看作神圣的职业。早在1952年，施蛰存的好朋友冯雪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主持人，来信邀请施蛰存去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工作，因为冯雪峰是最了解施先生的编辑才能的。但施先生复信婉谢了，他觉得他还是做教师好。从施蛰存对我的指教，我懂得了施蛰存先生当初的选择。

施先生非常清楚知识分子在新时期的处境、地位和职责，他来信说：“教师工资不久会调整，但不要有奢望，……不过，调整工资，一定从补贴方面加，不会从工资数字加。将来，讲师、副教授、教授的工资加补贴，数字差距不大，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教师要守得住清贫。他说：“现在是知识分子接受考验的时候，不耐清寒的都下海了，华东师大外语系的中年教师几乎全走了，有的出国，有的改业。上海的中小学青年女教师也走了一大半，大学里的理工科教师不离职还可以找兼职，只有文科教师情况最困难，他们下海之后，本业无用，只好改行，中文系教师，到一个企业中去做秘书也不称职，因为他们不会拟公文。我们的中文系，向来只讲现代文学，不讲语文，更不讲古文，他们的本领，在社会实用上，完全无用的。不过，要知道，文史哲学者，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所寄，没有这些人不行，有这些人而不用或不起作用的也不行，高等院校的文史哲教师必须自重，了解自己负有祖国文化的历史任务，万不能因物质生活条件不好而放弃自己的职责。今天，我看得出来，了解自己的历史任务的高校教师，是不会下海的，已经下海的，已证明他们本来没有能力继承或创造祖国的文化。”（1993年4月15日信）“现在世风不古，人人向钱看。但不必悲观，中国人才多，还有不少青年甘于淡泊，从事文学工作。经过时代的筛选，他们还不会同流合污。不过近来青年作家，水平不高，知识不够，这是一个问题。”（1993年9月24日信）

施先生始终对未来、对青年充满信心，虽然现在外面的诱惑很多，但施先生不悲观，他坚信有“甘于淡泊”、“了解自己的历史任务”的青年“不会同流合污”，排除一切干扰坚守着“祖国的文化”。施先生就是这坚守的榜样，施先生从事文化工作、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从不计功名得失，九十多岁的老人仍然潜心研究，笔耕不辍，为的是将损失的时间补回来。但他又将一切荣誉的功名置之度外。1993年，施蛰存荣获上海市第二届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当时的评委告诉我，施先生在颁奖会上发言说：“应该多奖励青年



人，对我这样的老人就不需要什么奖励了。”当时就有评委不能理解，说：“施老先生不领情。”我能够理解施先生的心情，这里正体现出他对名利的淡泊和对事业的热爱，也表现了对青年学者的爱护。施先生在1993年4月15日给我的信中说：“关于我的作品，你不要多写，多写了，一则发挥不出新的观点来；二则还有许多极左分子不高兴。我有些像沈从文，只想藏头不露尾，正在竭力求做隐士，你理解吗？”这里体现出施蛰存先生的出世精神，但施蛰存先生却以终身的精力投入到创造祖国文化的事业中，从而体现出他的积极入世，出世和入世竟如此和谐地统一在施先生的身上。记者李辉说得好：“对于有他这样成就和经历的人，功名于他的确是非常淡泊的，显赫也好，沉默也罢，任何时候他从没有停止过他的文化创造。世上有的人注定要表现他的智慧和才华，不管是处在何种境地，不管是采取什么方式。沈从文如此，施蛰存同样如此，这样的文人可以列举很多，对于他们，难得的是做人的态度，是对所喜爱的事业的执著，是文人传统中至为珍贵的淡泊名利。”（李辉《人生扫描》）施蛰存的人格风范和人生价值就体现在这里。

为了使我成为一个合格的高校教师，施先生还经常来信指导我的教学和科研。他来信说：“你讲现代文学，用什么教材？我觉得现在许多青年教师讲现代文学，甚至当代文学，只能照教材讲，自己没有新的意见，这也难怪，他们没有自己的经验，就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文学情况也不甚清楚，你如有志钻研一下，我希望你先看作品，自己先下判断，然后再看别人的评论，不要盲从。”（1991年10月1日信）我在以后的教学中，按施先生指导的，认真阅读作品，然后自己下判断，不受教材的约束，不被前人左右，学习和教学果然有了明显的进步。当施先生知道我既教现代文学，又教当代文学，学问做得杂而不专时，他便来信说，“我劝你放下‘当代文学’，专研‘现代文学’，够你教学十年了，过一阵，我空一空，再给你一个大纲。”（1991年10月22日信）

我曾一度想写小说，施先生知道后，写信说：“我劝你写论文、文评及文艺理论，这是属于你的本职工作。写小说可以，但是业余兴趣，写论文要有高水平，写小说不要长篇，外国已没有人看三十万字的小说了。”（1993年4月15日信）施先生不仅自己全身心地投入本职工作，兢兢业业教书育人，而且希望我们中青年教师也热爱自己本职工作，先把本职工作做好，然后才是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施先生一辈子都是这样做好自己应该做的每一件事情。施先生的不平凡就在这里，施先生的平凡也同样在这里。



对于文学创作，施蛰存也鼓励我尝试一下，施先生来信说：“现在美国盛行‘亚美文学’，有许多中国人写的小说大走红运，……你要写东西，不妨试试，但不宜再用心理分析及内心独白的文体，这个玩意儿已过时了。社会人物多，故事面广，都不宜用心理分析写法。现在时髦的创作方法是虚实实实，真真假假，有现实，有幻想，你不妨多看几本新作品，以为参考。”（1993年1月19日信）

我原打算写一本《施蛰存评传》，写信告诉施先生，施先生立即回信说：“我不赞成写我的评传，……我劝你写三十年代作家论，写十篇八篇，较有意义。你写我的传记，肯定写不好，因为我的文学方面多，你未必能全面理解，单写我三十年代的创作，加以评释，容易见好。”（1993年9月24日信）我于是以评论施蛰存先生三十年代的作品为主，果然容易见好。

施先生一再来信要我去上海看看：“欢迎你来看看上海的新气象。”我在与施先生通信七年后，于1997年底，专程去上海看望施先生。因为我感觉施先生的身体很不如以前了，写信的字迹抖得厉害，施先生也在信中说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今年身体不好，从春变以来，时在病中，你那边的书，捡出一些，始终未寄。”（1992年10月7日）“今春以来，我体力大衰，无力工作，正在绝对休息，不知秋深后能否好些。”（1993年9月24日）“上海已很冷，我不甚健，写字不便了。”（1995年1月7日）“近日仍不健，草草书此，祝贺新年佳胜。”（1995年2月4日）我必须立即去看施先生，我心中不安。

这是我第一次去上海，1997年12月26日，我从湖北黄石坐船到南京，再从南京坐火车去上海。不巧，我坐的客船在中途遇到大雾，船在江中耽搁十多个小时，我到达上海是凌晨两点，第二天早晨去看施先生。按照施先生给我的地址，我找到愚园路1018号，这是幢两层小楼，一楼是邮局，施先生住在二楼，施先生家没有前门，只能从后门上到二楼，这后门白天从来不锁，客人可以直接从这儿上楼，上楼后经过一个狭窄的楼道，楼道靠墙是一排书柜，书柜没有门，摆满了年代久远的颜色发黄的书籍，有很多线装书。顺着放有书柜的狭窄楼道便可走进施先生的房间。这是一间三十多平方米的卧室兼书房兼客厅的房间，房间靠西边和北边分别搁着两张床，一张靠北的大床是施先生的妻子的，靠西边的小床是施先生的。房间中间有一张方型饭桌，房间朝南有一扇窗，窗前有一个书桌。我进门就看见一位瘦弱的老人坐在书桌前看书，这便是施蛰存先生。施先生戴了一顶深蓝色的布帽，穿一件深棕



色棉袍。他身后有一个书柜，书柜内外，桌上地上，都是书，而且多是近年出版的新书。我来之前，就听吴福辉先生说，施先生听力不好，我于是准备了一张名片，当施先生疑惑地看着我时，我递上了名片。施先生的视力特别好，不戴眼镜。施先生看了名片后立即笑着说：“啊，杨迎平呀！我昨天刚给你寄了一张贺年片。”听到施先生这样说，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自从与施先生通信以来，施先生每年给我寄贺年片，常用一帧特制的贺年卡，正面是一幅浅棕色的国画，画有山石、积雪和梅花，右下边是一叶小舟，舟上有两个人，船头是一位穿古装的长发女子，或是悠闲地、或是期盼地看着前方，船尾是摇船的老翁，右边题有“泛雪访梅图”，落款“清阁作于一九六六年上海华楼”。背面左下角印有“赵清阁 泛雪访梅图”，“北山楼制 贺画史八十寿（1993）”的字样，右下角印有“北山——施舍”和邮编地址“200050 中国上海愚园路 1018 号”。有的贺卡正面是泼墨很浓的植物花卉图。贺卡里面，或是写着“奉贺新年新正，合第吉祥”“祝贺新年百福，合第吉祥”“贺新岁百福”的贺辞，或是长篇大论的写一封信，再加上祝贺的话语。

看到施先生身体精神还好，说话声音也洪亮，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施先生见到我特别高兴，我们通信几年第一次见面，施先生一时都不知道怎么接待我，不停的大声叫阿姨给我倒水，拿东西给我吃，后来突然想起来说：“有好东西给你吃，昨天一个韩国朋友送的点心。”施先生一边将一个漂亮的纸盒拿出来，一边很得意的笑着，兴奋得像个孩子。施先生将点心盒打开，让我自己拿，然后看着我吃，我吃了一口，施先生马上问：“好吃吗？”我说：“好吃！”施先生马上说：“那你多吃点。”然后自己也拿一块吃。他边吃边说：“韩国的点心也一般，不是特别好吃。”我们一边吃点心，施先生一边跟我谈他的作息时间和饮食习惯。施蛰存这时的作息时间是：上午看书看报，施蛰存订了多份日报和晚报，下午晚上写文章和接待来访，晚上睡得晚，早上起得晚。施先生告诉我，华东师大出版社在出他的文集，共四个部分，八卷本，全是他自己编的。第一部分为文学创作，分为小说一卷，散文二卷；第二部分是古典文学研究，分为诗学和词学各一卷；第三部分为碑版文物研究亦分为二卷；第四部分为无可归类的杂著，编为一卷。除掉译文，施先生的文字生涯，大约已集中在这里了。这是他在 90 多岁的高龄中亲自整理出来的。当时只出版了小说创作集一卷《十年创作集》。施先生当时就送我一本《十年创作集》，并说：“等出齐了，我给你寄去。”施先生当时将我需要的书一一签字送给我，施先生签字时，我给施先生照了一张照片，之后又跟施先



生合影。施先生还另外送给我他的照片，并在照片上签字。这次我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天天去施先生那儿谈天，受益匪浅。施先生说吃饭以粽子为主，早饭吃一个糯米粽子，中午不吃饭，下午和晚上吃点心。我说粽子不好消化，施先生说：“粽子好，饿得慢。”另外每天吃八颗红枣。他说：“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红枣是长寿食品，从那时起我也坚持每天吃八颗红枣，竟使我一直很低的血小板升起来了。

当施先生知道我是专程来看他，并在江中遇到大雾时，他便责怪我：“你看，你看，真不容易，你不该来，天气太冷，路上多辛苦！”听说我是晚上两点到上海，施先生立即说：“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我叫人去接你，你一个人怎么走？”我说社科院有位老师去接我了，施先生才放心。又问我找到住处没有，当知道我还没有找到住处，他立即说：“我给你写个条子给孔海珠，她也是社科院的，你去找她，她会给你安排好住处的。”我忙说：“不用，不用。”但施先生还是将纸条写好，施先生说：“不要紧，我跟她爸爸孔另境是同学，好朋友，她一定会帮你的。”我只得答应着，把纸条装好，保存好，这是一件很珍贵的纪念品，我没有去打搅孔海珠女士。我后来与孔海珠女士认识，并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当然是施先生给我们牵的线，那是后话。

这几天施先生精神状态非常好，同我天南海北的谈了很长时间。我也问了一些我疑惑不解的问题。1933年施蛰存与鲁迅为《庄子》与《文选》的问题有过论争，我问施先生，1934年7月《申报》杂文栏“谈言”上发表了一篇署名“寒白”的文章：《大众语在中国底重要性》，鲁迅在1934年7月17日致徐懋庸的信中说：“十之九是施蛰存做的。”我问：“这篇文章是不是您写的？”施先生立即说：“不是，我没有写这篇文章，我从未用过‘寒白’的笔名。”多少疑问，都能在施先生这里得到解决。

走近施蛰存，我才知道在个人生活方面施蛰存并不像他小说中的人物那样“现代”和“荒诞”，也不像他的朋友刘呐鸥那样风流。施蛰存虽然在作品中也写了一些都会青年的风流韵事，但施蛰存在生活中却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施蛰存1929年10月24岁时与比他大一岁的陈慧华女士结婚，到2002年妻子陈慧华女士逝世，共同生活了73年，但施蛰存对妻子忠贞不渝，疼爱有加。在施蛰存的文章中，我经常看到这样的句子：“太太泡好了一盏新买来的红茶送进来，醺醺的怪有温暖之感。”施蛰存每年给我寄贺年片，总是署名“施蛰存、陈慧华”可见施先生对妻子的尊敬。听施先生的孙女说，就是现在，家里有什么事，还是奶奶说了算，家里的财经大权也在妻子手上，



施先生买什么都是跟妻子要钱，施蛰存先生多迁就妻子。妻子陈慧华女士逝世后，施先生感到深深的孤独，他经常对来看望他的后辈说：“一个人很难过呀！”施先生终于在妻子逝世后不到一年就病倒了，如果有妻子陪伴着，施先生一定能闯过百岁大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施先生对妻子的依恋和深厚情感。

人们多认为施蛰存年轻时一定是个经常进出舞场的都会浪漫青年，有一天，我问施先生：“您爱跳舞吗？”施先生回答：“从来不跳舞。”我问：“您不是经常同刘呐鸥他们去舞厅吗？您在那儿干什么？”施蛰存在纸上给我写了四个字：“摆拆字摊”。

1999年9月，我终于去华东师大做访问学者，到上海的第二天就去看施先生，刚走到房间门口，施先生就看见我，便大声喊我：“杨迎平”，施先生真是好记性，一年半没见，竟能一眼认出我。施先生这时的作息时间表又有些变动，他改为上午接待来访，下午休息，晚上看书写作。饮食也有变化，这时早上吃一个鸡蛋，八颗红枣，中午照常不吃，下午吃点心，晚上吃稀饭，没再吃粽子。施先生的身体不如上次，写字时手抖得厉害，人也容易疲倦。但记忆力仍好，我问一些作品的出版时间、地点，施先生都能一口回答出来。华东师大的老师告诉我，施先生是文学上的百科全书，文革期间，施先生在资料室工作，老师们查资料，要什么书，以及什么内容，施先生就能告诉你所要的资料在哪本书里以及那本书在书架的哪个地方。一次他们编词典，施先生当顾问，不论什么问题问到施先生，他都能立即回答出来，并告诉出处，大家一找一个准。

1999年12月17号，我去看施先生，看见施先生与他儿子用上海话在争吵，我一句也听不懂，施先生跟我说话一直用普通话，跟家人却用上海话。我因听不懂，就问施先生：“怎么哪？”施先生用普通话对我说：“他们要我去医院，我不去。”原来施先生这段时间心脏不好，他儿子要他去医院住一段时间，他坚决不去。施先生自从1983年因肠癌开刀，在医院里住了十八个月，就害怕住院，因为在医院不自由，医院不让施先生看书，施先生是一天不看书就不能活的人。施先生当时对我说：“我没病，就是老了，没气了。”施先生常对我说：“我还活两年，两年时间。”1997年他就对我说过，这次又说，施先生的意思是，两年时间他的文集就能全部出版。我笑着说：“您两年前对我说过，再活两年，您有许多个两年。”施先生也笑着说：“再活两年就行了。”施先生乐观、豁达、善良、热情的生活态度，是他长寿的秘诀。